

營營里卷

歷史、教育與文化演講集

李弘祺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卷里營營：歷史、教育與文化演講集/李弘祺
著.--初版.--臺北市：允晨文化, 2012.03
面；公分.--(允晨叢刊；136)

ISBN 978-986-6274-67-1(平裝)

1. 言論集

078

101003208

允晨叢刊 136

卷里營營：歷史、教育與文化演講集

作者：李弘祺

發行人：廖志峰

責任編輯：周汝婷

校對：楊家興

美術編輯：劉寶榮

法律顧問：邱賢德律師

出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網址：<http://www.asianculture.com.tw>

e-mail：asian.culture@msa.hinet.net

服務電話：(02)2507-2606

傳真專線：(02)2507-4260

劃撥帳號：0554566-1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

製版：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裝訂：聿成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2012年03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300元

ISBN：978-986-6274-67-1

港台書

營營里卷

歷史、教育與文化演講集

李弘祺



自序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有耀自他，我得其助。——梁紹壬《兩般秋雨盒隨筆》

曾不知路之曲直，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楚辭》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東坡詞

書名《卷里營營》，因為一輩子像一隻沒頭的蒼蠅一樣，到處翻讀典籍；像傅斯年說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所為為何？直堪細嚼。但這的確是我開始學歷史的寫照。當然，傅先生的視野及關心主要是在當時中國的歷史學、語言學和考古學上面。

多年來，旅遊四處，看的是博物館、寺廟、教堂。而聽音樂會、與哲人交談，自然都有瞬間的詩意和心得。或亦徜徉溪畔山巒，聆聽大自然的聲響。這些時候，總不免想到貴其迪尼（Guicciardini）的「我們都知道，人必有一死；但是我們都活著，好似不會死一般。」感受真是非常震撼。

耶魯、香港中文大學或紐約市立大學的煎熬與狂喜，使我逐漸神入思想史和教育史的世界。或三餘之際，讀書到微曦之將明，窗外積雪盈尺，宛如仙境。或鎮日思索，一無所得，俯念聖人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竟也是另一番境界。西方思想史繽紛精彩，而中國思想史則涓滴長流，卻都能一貫地彰顯出各自的中心關懷。到了互相作比較，原如涇渭的互為涯岸，卻化作子期與伯牙的相知。能通貫交融，裏外合一，而不留癥痕，這就是通達。究其實，途徑不外就是讀書和思考。

所選七篇文字，主要是在營營「找材料」之外，被邀到各地演講的文章。恢弘擴

大一己的視野，亦足自珍。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良有以也。我與「他者」(the other)之間，當然可以相互觀照，尤其是在今天後現代思想充斥的世界裏。交流以激引靈魂的火花，照亮無知的洞穴。也真的或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解碼迷思，往往是用「他者」的睿智。雖然參透之後，也或許會發現了無新意。然而心靈的溝通，終必有一隅之得。千里之行，始於跬步。閱萬卷書，所得非一。慧見生焉。

本書所收七篇文章是在歐洲、日本、韓國、中國、香港與臺灣發表。讀者或會問為何沒有美國。當然，在美國也曾各地應專門的邀請、或定期研討會的安排，在哈佛、古仁訥(Grinnell College，在兩校演講傳統中國的學生)、普林斯頓(講傳統中國的學規)、哥倫比亞(講中國的蒙書與幼學教材)等地演講。因為講辭都是根據我的英文原書(*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a History*)，而現在都已經收入我即將出版的《學以為己：傳統中國教育史》(香港中文大學，二〇一二)，因此不在這裡另外出版。早年在史坦福、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或華盛頓大學發表的文章，年代已久，必須再重新修訂，增刪，只好留待他日。

感謝廖宜方博士、陳信宏先生和盧加慧小姐幫忙翻譯。也感謝廖志峯先生安排出版事宜。

二〇一二年元宵日於清華人文社會學院辦公室

自序 3

什麼是偉大的歷史作品？ 9

附錄——學習歷史應該研讀史學名著 42

中國傳統教育的特色與反省 73

書院——傳統學術的中心 127

中國科舉制度與家族結構的改變 159

人與人文學——現今東亞的文化溝通與共生關係 189

省思中國人對漢學的省思——從「另一個傳統的另一個傳統」之優勢／非優勢觀點談起

矢內原忠雄與東京大學的通識教育——意義與省思 227

什麼是偉大的歷史作品？

本篇發表於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臺灣大學講座教授（二〇〇二—二〇〇五）的就職演講。現在只作了錯處的小修改。

又，臺灣大學出版社出版有該次演講的DVD版。

歷史研究最重要的責任和目的一般都說是求真。這個說法並沒有錯，但是為什麼要求真，這纔是根本的問題。事實上，研究歷史，目的就是希望能對人類的未來，做出更完美的規劃，幫助人們創造更為光明的前程。要這麼做，歷史當然必須建立在可靠的事實基礎上面。因此，歷史求真的意義就是為了使我們對未來的憧憬有一個更可信賴的根基。也因此，人類寫了許多偉大的歷史著作。然而，什麼是偉大的歷史作品？這卻不是

一個容易解答的問題。很多學歷史的人可能對它也不甚了了。就是有一定看法的人，他們之間的觀點也往往人言人殊。這個問題有一個真正的答案嗎？今天我想就這一點做一個分析，同時提出我自己對什麼是偉大的歷史作品這樣的問題的個人看法。

有一點是大家都會同意的，這就是偉大的歷史作品在它剛寫成出版的時候不一定馬上引起人們的注意。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事，也是讀歷史的人最大的困窘。雖然各位不一定都是學歷史的人，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讀歷史的作品，逃不掉讀歷史書的命運。並且應該說，沒有人會否認讀偉大的歷史作品是人生裡十分重要的責任，也是一件很值得享受的樂趣。

反映時代的精神和關心

例如錢穆的《國史大綱》，它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人對中國歷史的崇敬和想象。錢穆的書最大的特點便是民族主義和愛國精神。也許今天的臺灣人在我們的時空一點也無法

感受他那種關心，因為今天的臺灣，沒有太多人能同情、理解他所提倡的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和中國歷史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文明了。事實上，我們根本懷疑為什麼這樣一個偉大的文明會創造出像共產黨或舊的國民黨那樣的政府。在這種情形之下，一本稱頌中國文明和精神的歷史已經失去了它的客觀性和吸引力了。我們自然很難認定錢穆的《國史大綱》會是一本偉大的歷史著作。然而在當年的中國，錢先生的書當然是一本重要而偉大的歷史著作。

相同地，寫於拿破崙軍隊兵臨城下，費希德（J. G. Fichte）的《告德意志國民書》，這本書也曾經振奮了當時德國的國民，雖然當時，德國還沒有統一，但是使用德文的人們已經開始有「民族國家」的觀念和自覺；開始覺得德國人有他們自己的美好文化和歷史，並不比被暴民推翻的法國文化遜色。以前德國受教育的人以能用法文寫作交談為榮，現在他們覺得這現象很慚愧，於是開始提倡用德文交談，用德文來寫他們自己的歷史，好締造德國的認同感。在這樣的氣氛之下，拿破崙的入侵當然引起日爾曼諸邦起來奮戰。《告德意志國民書》在這樣的歷史環境裡，自然能激勵當時人的決心。雖然

這本書不是一本嚴謹的歷史著作，不過，我們可以用它來代表一本能反映時代精神的著作。

我們知道近代民族主義興起，其主要的理論是在德意志的地區發展出來的。簡單地說，德國人認為國家是自然和歷史的產物。所謂自然，它指的是人類生來就免不了的生存條件：他所依賴的最根本的、不可避免的環境，在自然條件方面，就是山川物產這樣的東西。就歷史條件言之，人類生來便屬於一個逃避不了的群體，這個群體以血統和語言為要素。它是這個人生存不可或缺的生命共同體。這樣的東西是歷史的產物。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是這兩個自覺的糅和而形成的。人類屬於一個他所認同的共同體，自然的會覺得自己的生命和價值都與這個共同體息息相關。同時把自己的歷史投射在自然環境上，覺得自己的鄉土永遠是最美好的，很難讓自己接受別的山川歷史。同一個共同體的人們的活動於是創造了這群人的文化，在一定的空間／土地上面持續成長，並一代一代地繼續滋養這團體的生活條件和性格。從此而發展政府，用它來保護和維繫共同的關心和生活的理想。一本重要的歷史書自然會表現出這個共同體成員的精神和價值。一本偉

大的歷史著作很少不反映出這樣的精神和關心的。

上面說的民族國家的信念在十九世紀的德國發展特別成熟，因此日耳曼民族訓練出來許多重要的歷史學家，他們多以擅長敘述德意志的歷史而聞名。蘭克（Leopold von Ranke）便是以《日耳曼與羅馬民族的歷史》（*The Histories of the German and Roman Peoples*）成名，奠定了他的聲譽。到他死時，這本書已經一再修訂和增補，變成了長達五十四卷的大書。以後還有許多德國史家踵續蘭克的志業，把闡述德國民族國家的歷史當作是歷史寫作的中心任務。

但是蘭克的重要性不只是在他的求真精神，更是因為他把路德教派的信仰提升到以前人們沒有想到的層面。我們都知道：德國的文學和德文的運用都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奠定的。路德所翻譯的《聖經》是最早的德文作品之一，德國人很多都是路德派的基督徒。因此一本像蘭克的這種書很自然地成了人人可以共鳴的作品。這樣的書，讀者很多，大家受它的影響，當然就傳佈很廣，變成了偉大的、人人讚不絕口

的名著。

相同的，十八世紀英國的休姆（David Hume）寫了《英國史》（*History of England*）成為名著，以後馬考萊（Thomas B. Macaulay）繼續寫成《詹姆士二世登基以後的英國史》（*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Succession of James II*），也成了凝聚英國人崇尚英國傳統和價值的重要著作。英國是經歷宗教改革和清教徒革命的國家，因此對宗教的熱誠幾乎是瘋狂。到了休姆的時代，人們已經普遍感到厭煩，開始覺得英國的基本立國精神應該是在於結合各色各樣不同的價值和信念的決心和能力，而不該過分讓宗教的熱誠支配生活。因此他認為支持革命的自由派的觀點不可以作為支配英國文化的唯一動力。這種反惠格（Whig）派的觀點雖然和我們今天的想法有點出入，但是由於這是當時普遍的看法，所以能引起當時人的同情和共鳴。

接續他的馬考萊，他寫作的時代是英國帝國發展的高峰，他主張英國當時的種種成就是全人類都應該憧憬並努力模仿的對象。這樣的態度反映了當代英國人（特別是中產

階級）的自信。也怪不得人們認為他寫出了十九世紀英國人的心聲，是偉大的歷史著作。但是馬考萊寫了五卷，也不過只涵蓋了十七年的歷史，嚴格地說，這樣的歷史應當不會是什麼好的歷史，但是讀它的人卻非常多。馬考萊相信歷史寫作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大眾。他的文字優美，提倡的正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自由派思潮，因此洛陽紙貴，成為空前未有的巨著。讀他的書的人感到他們的理想在書中得到了充分的鼓舞和讚許，因此就使它更廣為流傳，成了人人談論的偉大作品。

但是，並不是所有偉大的歷史著作都只在歌頌自己國家或政府，有的是對自己的國家做出十分嚴苛批判的。事實上，對時代精神的反映並不一定必須限在國家的這個範疇。例如明末的遺民王夫之寫的《讀通鑑論》和《宋論》，或者黃宗羲嘔心瀝血所寫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都充分地把亡國之痛表達出來，它們反映的是當時人的真正感情，因此他們都成了非常傑出的歷史家。不會有人懷疑這些作品是偉大的作品。與他們大約同時的顧炎武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顧炎武的《日知錄》表面上看來，只是一本嚴謹的、考證的書，但是它的精神在於實事求是，正好反映了明末思想家的自覺。他們